

现代中国学与文化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加加美教授论文读后感——

周 星

(爱知大学)

近几日，认真拜读了加加美光行教授提交给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2007年度国际学术会议，并供与会学者们展开讨论的学术论文“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共同态度论’的提倡”¹，感到深受启发，在很多方面也有共鸣。虽然，在大多数时候我很难把自己也定义为一个地域研究者或从事现代中国学的学者，但是，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我也希望能够对加加美论文做一个积极的回应。

“共同态度论”可能吗？

加加美论文的课题意识非常明确，这就是要为脱胎于“地域研究”的“现代中国学”，提出一个具有方法论属性的新的研究范式。为此，加加美教授颇为详尽地叙述了以中国为对象的地域研究在美国和日本兴起、挫折和发展的历史。

在加加美教授的介绍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问世的“中国研究”，非常明显地受到当时在东、西方两个阵营之间已经和正在形成的冷战结构的影响，同时也和亚、非、拉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所导致的旧的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崩溃、解体的历史趋势有着颇为密切的关联。以上述世界历史的大格局为背景，此类地域研究或中国研究，曾毫不掩饰它所具有的为美国历届政府所期待的那种“国策研究”的属性，其中既充满了直接服务于封杀中国红色政权以及继续以新殖民主义等方式支配第三世界各国的企图，包括与此有关的种种涉及现实政策需求的“问题意识”，同时，也非常露骨地充斥着“东方学”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它的基本逻辑是把亚、非、拉美等对象地域看作是“蒙昧”、“野蛮”或“低级”的，然后再将它与“文明”的西方自由世界相对置。

日本的以中国为对象的地域研究也不例外，加加美教授非常尖锐地指出了它和战前、战时日本帝国的有关“国策研究机关”之间的密切而又复杂的关联性（满铁调查部、东亚研究所等），尤其是指出了战后在日本很快就被美国纳入冷战结构的西方阵营之中的背景之下，日本的中国研究，也同样地带有“国策研究”的属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影响，其中也同样地存在着日本作为亚洲之“中心”的意识等。尽管在美国和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多少都有一些学者曾经具有同情中国或第三世界的对象地域的倾向，或者也有

¹加々美光行「現代中国学の新たなパラダイム—コ・ビヘイビオリズムの提唱—」、2007年度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2007年12月15-16日。

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和较为纯粹的学术研究，而试图与国策属性的地域研究有所不同，但是，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的本质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力学中，终归不能摆脱那种为母国政治或国策服务的框架。

但是，在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地域研究中确实也存在一些反省，反省长期以来存在的对于非欧美世界的无知、误读和曲解，地域研究中也始终存在着试图获取有关各种对象地域的更为精确的知识，以及能够正确地解释或者判断在那些地域里所发生的事件、进程及其真相的渴求。导致在所谓地域研究中经常产生误读和曲解发生的原因，既有直接把在西方世界形成的多种“社会科学”的分工、理念和方法用来研究非西方世界或地域时的“适用性”问题，也有在这些“社会科学”背后实际上若明若暗地存在着的欧美中心主义式世界观体系的妨害等。此外，还有地域研究之类的领域，从一开始就被牢固地镶嵌在了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包括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等）关系之内，同时，在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事实上早已“制度化”地形成了非对等的关系。林武、詹姆斯·派克、赛义德、科恩、加加美等人对地域研究、中国研究或所谓东方学所作出的揭示、反思和批判，大概都是可以从上述文脉中得到理解的。

加加美教授对于美国和日本的“中国研究”所作的描述与分析，有很多地方令人颇感回味。例如，指出其把西欧的现代化视为标准模式用来判断中国局势的动向，指出中国研究领域的来自财界的基于情报需求的动机，指出中国研究的分析路径的逐渐多样化，指出“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中国研究的变化等等。在我看来，的确如加加美教授指出的那样，对于中国研究乃至于广义的东方学的很多反思和批评，并不是为了否定中国研究本身，而是试图建构新的“现代中国学”。只有当此类反思和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中国研究领域的“常识”，或者成为基本的工作原则的时候，真正具有科学实践意义的现代中国学才有可能最终被确立起来。但现实是，国策指向依旧，虽历经反思和批判，可东方学式的偏见依旧在中国研究领域里常态存续，中国研究领域的整体方法论问题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加美教授提倡“共同态度论”来尝试作为现在中国学的方法论，同时，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研究中心也试图尝试在各种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去检验这样的方法论²，我觉得，此种努力和尝试本身是很有意义的。

加加美教授把胡塞尔的“共同主观性”（世界知识的结构和世界存在的结构，共同主观的存在结构）概念予以引申，采用了更加具有主观的动态属性涵义的“共同态度性”，作为其中国方法论的核心概念。加加美教授批评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缺乏实践性的弊害，而较为赞赏科恩在批判中国研究中存在的东方学式的偏差和偏见的同时，还进一步致力于建构新的中国学方法论的努力。加加美教授认为，由于现实世界的存在结构（美国霸权之下的国际秩序与欧美中心主义的国际政治格局）丝毫没有被动摇，甚至也没有引起多少真正的关注和质疑，东方学式的欧美中心主义只是作为“认识结构”受到了一些批判，因此，在中国研究

²参照加々美光行著『鏡の中の日本と中国：中国学とコ・ビヘイビオリズムの視座』、日本評論社、2007年8月。愛知大学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中国の発見—中国学方法論のパラダイム転換』、中国学と現代中国学構築研究会COE最終報告書、愛知大学、2007年3月。

中现在依然存在的那些偏差和偏见，已经成为大家熟视无睹的常态（或持续性地被“再生产”出来），也就不难理解了。显然，要克服这种局面，除了新的方法论理念之外，还有待于现实国际政治格局的更大变迁才有可能。

“中国”世界作为中国研究的对象（客体），它并不只是一个静止、沉默、毫无反应和完全被动的地域。它是“共同主观性”及“共同态度性”舍之就不能成立的，自身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客体。竹内好所提示的“抵抗”、“挣扎”，至少在中国其实是一直贯穿有“中华思想”的支撑。在中国文明中生成和延续至今的“中华思想”，即便是在西方冲击下迭出破绽，即便它饱受攻击、藐视和不屑，它依然顽强地存在，并反复地出现，它和欧美中心主义的遭遇和对撞，可能是加加美理论需要再作认真思索的问题之一。要克服甚至在对欧美中心主义的批判中（阿明，弗兰兰，沃勒斯坦等人）也往往会蕴含着同样的认识结构这一类“悖论”，或许就有必要把中国式的自我中心主义（中华思想）也列为“共同主观性”或“共同态度论”的讨论话题。无论中国研究领域里的研究者们是采取理想主义的（重视主观价值判断）态度，还是实证主义（重视或强调客观事实）的方法，实际上都需要对截至目前在中国研究领域里积累起来的诸多反思逐渐形成共识，进而也都应该把对象地域不是只作为客观的“物”，它同时也是主观的“人”。我觉得，这大概才是“共同态度论”之成为可能的关键。

来自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学）的呼应

具体地从文化人类学的中国研究³来说，我觉得，在它作为地域的中国研究之间，确实是有很多的共同之处，有可能、并且也值得进行一些比较。事实上，在不少国家的地域研究中，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者往往是承担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翼。本文就是想通过此类比较，来对加加美教授的“共同态度论”有所唱和与呼应。

众所周知，文化人类学虽然是以“文化”为研究对象，但它关注“异域”和“他者”的传统，使得我们很容易把它和地域研究来做类比。的确，对于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地域研究的对象，不如说也是“异域”和“他者”。截至目前，文化人类学基本上都是在和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分工中，承载着西方世界关于“异域”和“他者”的多种复杂想象。

文化人类学虽然擅长于对微观、具体的社区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同时，它也拥有一种所谓的“整体观”，亦即倾向于把对象社区或对象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这一点，它和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颇有相像之处。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论来看，如何去理解如此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和内涵复杂，并且具有无数面孔的“中国”，确实是存在很多难题的。费孝通教授在回应有学者对其“江村”研究的质疑时曾经说过，江村确实只是长江三角洲的一个村落而已，但它确实是中国的农村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农村。虽然这样的回应未必能够完全让质疑者感到满意，但我觉得费孝通教授的上述回应其实是有依据的，他是透过一个微观

³中国国内或有人称之为“汉学人类学”，但此处这一概念并不是很合适，因为它排除了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类学研究。

的社区（江村）试图去理解中国农村，甚至整个中国的。显然，以中国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和现代中国学，都需要有整体性的视角，也都需要能够在整体上来把握中国（中国历史、中国文明和现代中国社会）的方法论。

文化人类学包括以中国为对象的民族学等，在有很多地方，也面临着和中国研究同样的困扰，例如，先入为主的西欧中心主义式的偏见等。众所周知，早期的文化人类学是西欧世界的知识界在和西欧世界的接触中创出的。它一开始就是对异域、异人种、异文化和异民族（亦即他者）的研究，也从一开始就充斥着西欧世界的傲慢和中心主义。就像进化论把非西欧的世界定义为“蒙昧”或“野蛮”，而把自己定义为“文明”，或者像传播论者那样把有些民族看作是只能接受文化的传播，而缺乏创造文明的能力等，西欧中心主义支配了早期的文化人类学。

后来，殖民主义也一度支配了人类学。为殖民主义当局服务，培养精通当地土著文化的殖民地官员等，由于此类缘故，使得人类学者在战后纷纷独立的各国均不受欢迎，或遭到抵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国民性研究”与所谓“文化与人格学派”，曾产生了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那样的作品，它在日本国内曾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包括批评。战后国民性研究的急剧衰落，意味着文化人类学对于和政府的国策如此直接的关联有所警觉和反省。战争年代的日本民族学，曾经是与军部直接连通的，当今的日本图书分类体系中民族学的位置似乎仍旧是和地理学、地政学等更为接近的⁴。对此，战后的反省可谓是姗姗来迟，而致力于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学之关系进行深入反省的学者，甚至还要面临冷遇或沉默的压力⁵。就此而论，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学）和中国研究其实也是有为接近的状态。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对来自西方的人类学采取排斥甚至取缔（例如，中国曾把人类学视为“资产阶级”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学科），这其中固然有意识形态极端化的时代背景，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殖民主义污点，也是导致此种局面的原因之一。

不过，文化人类学即便是在早期，它也有一个可能在中国研究或地域研究中往往并不是很清晰的较为纯粹的学术性的目标，这就是对于全人类文化形态之多样性和普遍性的终极关怀。在追寻这个学术性目标的过程中，西方人类学经常出现的问题便是所谓西欧中心主义，用西方或欧美的文化尺度或价值观、世界观，去理解、评论和判断异己的社会与文化，这自然是会带来严重的无知和偏见；但在另一方面，异文化理解的另一个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则正好相反，它便是对异文化进行浪漫的“误读”，所谓“高贵的野蛮人”式的他者理解便是如此。通常，发生此种误读的原因，是需要研究者所在的国家或社会里去寻找答案的，就像一个过着美国、日本式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人类学爱好者，往往却会把自己的精神或某种期许寄托给青藏高原的藏族宗教生活或草原牧民的更为贴近自然的世界观里一样，美国和日本的中国研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礼赞，或对于“赤脚医生”之类事物的美化，可能也和人类学者经常会有有的浪漫误读一样，都是需要在他们所在的社会里去寻找解释的。来自异域和异文

⁴周星“殖民主义、日本民族学及中日学术交流”，林振江、梁云祥主编《全球化与中国、日本》第433-453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10月。

⁵参照中生勝美編『植民地人類学の展望』、風響社、2000年8月。

化的知识，往往会使得研究者所在的那个社会里的很多常识都可能变得相对化，就此而论，可以说人类学原本具有的“异议申述”的价值，正是由于在人类学者所置身的社会和文化里原本存在着某些不满或缺才得以成立的。

文化人类学经过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积累，确实揭示了人类文化与行为的几乎是无限的多样性，如果说人类学还认识到了人类所有不同文化的什么共通性或普遍性的话，那可能正是几乎无所不在的本民族中心主义了。西欧中心主义、中华思想、日本居于亚洲中心的理念，还有阿依努人自称“人类”的朴素认知，在本质均无不同⁶。只是国际政治秩序的权力结构现实使得欧美中心主义似乎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因而它也具有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性，中华思想的顽强存续在此种结构中，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抵制。

20世纪60年代以来，起源于美国的文化相对主义迅速地成为了文化人类学从业者的工作伦理和基本信念。简单地说，文化相对主义是指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不能为其他文化所替代的价值，在涉及不同文化的价值判断时，不能够用一种文化的标准去判断或诋毁另一个文化的价值。虽然文化相对主义若走向了极端，将有可能导致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方法失去有效性，但它之所以依然能够成为该领域的基本共识，乃是因为到了舍此文化人类学便无法生存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自我中心的人类学者到处都不受欢迎，他们或被迫转向研究本国的社会与文化，或者最低限度地接受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家乡人类学”、“第三世界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相互的人类学”等等，所有这些动向无一不在校正着文化人类学领域内事实上始终存在着的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的非对等关系。

文化人类学在遭遇到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之前，主要是以大洋孤岛的原住民为对象的，但当它面临规模巨大、历史悠久、高度异质的文字大国或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时，不仅其较为适应高同质性和小规模社会的研究方法论会出现困难，而且，还会面临或遭遇到家乡人类学和第三世界人类学、人类学中国化⁷的一系列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和他的人类学的意义，就在于他确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彻底改变了人类学的中国研究的格局。在方法论上，人类学依然是可以研究异域、异文化和他者的，但它会被指出如何才能“进得去”的问题，而那些被研究的对象和地域再也不是沉默无语的了，再也不只是充当西方理论的资料提供者或检验场所，家乡人类学和第三世界人类学使用大体上相同的方法开始研究本国和自己的社会与文化，并试图和外来研究者“对话”，虽然此类本土文化研究者将面临能否“出得来”（摆脱中心主义束缚）的质疑，但它迫使外来的文化人类学者放弃或收敛起欧美中心主义而采用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然后，才能以此为前提实现不同的人类学知识体系之间的对话。

或许是为了对抗或抗衡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在中国国内也出现了所谓的“美国研究”和“日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其国策指向或方法论的困扰和美日的

⁶周星《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华’思想》，岳黛云、勒·比雄主编《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⁷[美]顾定国著，胡鸿保、周燕译《中国人类学逸史》第311-31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关于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问题，还可参考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5月。

中国研究相似。虽然中国学者对于自己国家的状况并非全面无知，但在中国国内确实没有发展出以“中国”自身为对象的综合性的学术领域。这一点和文化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有所不同。文化人类学虽然发展出了以本土的社会和文化为对象的“家乡人类学”和“中国民族学”，但暂时还没有能力把中国以外的世界也纳入研究的对象范围⁸。为了解人类学领域中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国人类学者曾经提出“相互”或“双边”的人类学理念⁹，这或许对于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学多少也能有所参考。

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除了国策志向之外，它和文化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一样，都在他们各自的社会中扮演了描写和解说“中国”这样一个异域世界和他者形象的责任与职能。在有些时候，它们对于中国的解说和描述会影响到国民的印象和认知，进而也能间接地影响到所在国家的外交政策。其实，这些解说或描述大都是可以类型化的，例如，或者是“妖魔化”的（威胁论、崩溃论等），或者是理想主义式的误读（文化大革命礼赞）和夸张（中国抬头/崛起说），或者还有为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而把中国描述成天方夜谭式的、不可理喻式的等等。它们在很多时候往往与中国这个异域、他者的真相相去甚远，而更加应该从他们自己的社会去寻求说明。但是，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外部视角的现代中国学往往也有很多真知灼见，它对中国社会的某些批评非常值得中国的学术界深思。

“异域”既非天堂，亦非地狱，“他者”既非魔鬼，也非高贵的野蛮人。21世纪人类的命运，依然取决于地球上所有主要的国家、宗教和民族，当彼此互为“异域”和“他者”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共同态度论”的现代中国学方法论是意味深长，值得认真去实践的。

小结

目前，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似乎还没有被中国国内视为是正式的“人文社会科学”¹⁰，其中某些涉及历史、文学和传统文化的部分比较容易被中国国内所接受或汲取，而另外一些则可能是在不同的叙述文脉里被作为海外的“情报”来理解的。当然也有被中国目为含有“敌意”而遭致拒否的部分。正如加美教授曾经指出的那样，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它的目的论、国策指向、主观价值判断等等，其实都不是那么可怕，值得担心的只是研究者对于此种

⁸最近几年，为了克服“单向”的人类学的局限，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已开始致力于指导博士课程研究生，以中国周边国家（泰国、蒙古、印度、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为研究对象，从事长期的田野调查，进而撰写博士论文。这种动向现已引起中国人类学界的广泛关注。参阅高丙中“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⁹周星“关于‘双边’与‘相互’的人类学”，《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

¹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编的《日本文学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学、哲学、宗教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和民俗学等各分科，它只是提到“地域研究”（第2页），却没有所谓“中国学”的名目。在另一方面，介绍日本中国学研究成果的系列性丛书也有不少，如中华书局出版，由王晓平主编的《日本中国学文萃》等。

目的论、国策指向和主观价值判断有没有一种自省或者觉悟¹¹。不仅如此，现代中国学除了它的国策指向和目的论之外，是否还需要或者还可能拥有一个更为学术性的目标？正像顾定国博士所提问的那样¹²，人类学究竟是“普世性科学”还是“民族国家科学”？也许中国研究也需要面临类似的提问。

近5年来，我自己作为 ICCS 的成员之一，确实也经常为“现代中国学”的一般理论及方法论的有关问题感到困扰。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我实际上一直面临着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我主要是从广义的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学，甚或包括民俗学）这一专业学术领域，来参与 ICCS 的工作与相关学术活动的。标榜以建设新的现代中国学为目标的 ICCS，的确就像是一个诸门学问聚会的“广场”（多学科的“学际”交汇），自己固然是能够从这种状况中学习很多新的知识，但也经常感到无所适从，由于缺乏共享的一般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之间，往往并不能有很好的沟通。二是作为旅日中国学者，在日本从事有关中国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国民族学、民俗学），在我看来，其实是具有“家乡人类学”的一些特点。可是，以我这样的立场或角度，是否应该或是否有可能参与以地域研究为基础的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呢？尤其是在认识到它所具有的固有属性是以“国策研究”为指向时，同时也在认识到它内含着东方学的基本逻辑和西方中心主义式的世界观时，像我这样的海外华人研究者或许是应该与之保持距离的。

之所以能够克服上述困扰，参与爱知大学 ICCS 的有关建构现代中国学的学术活动，主要就是因为以加美教授为首的 ICCS 的理念，使我能够接受，也比较认同。这就是尊重对象地域的主体性，对等地看待和重视来自对象地域的研究成果，时刻反省地域研究中实际上始终存续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研究者和其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克服地域研究中实际存在着的在对象地域面前居高临下的姿态，并努力在研究者的主体性和研究对象地域或国别的主体性之间发现和建立互相联动的共同主体性态度等。正是由于加美教授提倡的“共同态度论”，对于对象地域或国家的研究者或其学术研究也有足够的关照，才使得像我这样的研究者觉得即便是在日本的现代中国学这一领域，也是有可能在彼此的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以及在不同谱系的知识体系的对话过程中使双方都能够获益匪浅的。由于“共同态度论”包含了对欧美中心主义和国策指向的反省，包含了对于对象地域的知识体系的认可以及致力于与之对话和交流的姿态，因此，我由衷地希望爱知大学 ICCS 目前正在努力建构的新的现代中国学，也能够得到来自中国国内学术界的呼应，这也是我愿意参与它的工作的动机。

¹¹加々美光行「現代中国学原論」、愛知大学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2005 年度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集『現代中国学方法論とその文化的視覚』第 5-37 頁、愛知大学、2006 年 11 月。

¹²[美]顾定国著，胡鸿保、周燕译《中国人人类学逸史》第 298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12 月。